

长篇小说系列
旅外作家
小说界文库

s h i b a j i e
s h i b a j i e
s h i b a j i e
s h i b a j i e

十八劫



虹影著

shibaajie

上海文艺出版社
Wang

xiaoshuojiewenkun

旅外作家
长篇小说
系列

十八劫

虹影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魏心宏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十 八 劫

虹 影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625 插页 2 字数 161,000

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册

ISBN 7-5321-1680-8/1·1356 定价：12.00元

出版说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。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小说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98年8月

第 一 章

1

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,甚至对亲人,甚至对最好的朋友。先是有意忘记,后来就真的忘记了。十八岁之前,是没人记起我的生日,十八岁之后,是我不愿与人提起。不错,是十八岁那年。

学校大门外是坑坑洼洼的路面,向一边倾斜。跨过马路,我感到背脊一阵发凉……一定又被人盯着了。

不敢掉转脸,只是眼睛往两边扫:没有任何异常。我不敢停住脚步,到了卖冰糕的老太太跟前,我突然掉转头,正好一辆解放牌卡车急驶而过,溅起路沿的泥水。两个买冰糕的少年跺脚,指着车乱骂,泥水溅在他们的短裤和光腿上。老太太将冰糕箱往墙头拉,嘴里念叨:“开啥子鬼车,四公里火葬场都不要你这瘟丧!”

一阵混乱之后,小街还是那条小街。

我楞楞地站在杂乱的路上。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说话太

多,弄得自己神神经?从童年某个岁数起,我时不时觉得背脊发凉:我感到有一双眼睛盯着我,好几次都差一点看见了盯梢的人,但每次都一晃而过。

那个男人,头发乱蓬蓬的,从没一点花哨色彩闪入我的眼睛。他从不靠近我,想来是有意不让我看清。只是在放学或上学时间才可能出现,且总在学校附近,也从不跟着我走,好像算准了我走什么路,总等在一个隐蔽地方。

这一带的女孩,听到最多的是吓人的强奸案,我却一点没害怕那人要强奸我。

我从未告诉母亲和父亲,不知如何说才好,说不清楚。很可能,他们会认为是我做了什么不规之事,臭骂我一顿。好多年我独自承担这个秘密,渐渐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惧意味,甚至不再神秘。每次有目光盯着背脊——大约隔半月或十天,我总有背脊发凉感觉。此事本没什么可怕可恨,可能与生俱来,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。人一辈子,恐怕总会有某个目光和你过不去,对此,我可以装作不在乎。说实在的,平时愿意看我一眼的人本来就太少。

而每次我想抓机会捕捉这个目光,它为能躲开我不过是为了某种确定。而我就像过分小心地逮一只翠绿的蜻蜓。或许虚飘飘的东西本不应该拽紧,一旦看清,反有大祸?

我不敢多想这件事,那一年我的世界闪忽迷离,许多事纠缠在一块,串成一个个结子,就像我行走的小路边,石墙上的苔藓,如鬼怪的毛发一般,披挂下来。

我的家在长江南岸。

重庆南岸是一片丘陵地，并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，留下一道道沟坎。如果长江发千古未有的大水，整个城市统统被淹，我家所居的山坡，还会像个最后才沉没的小岛，顽强地浮出水面。这想法，从小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安慰。

坐渡船从对岸朝天门码头，可到离我家最近的两个渡口：野猫溪和弹子石。不管过江到哪个渡口，都得在沙滩和坑坑坎坎的路上，往上爬二十分钟左右，才能到达半山腰上我的家。

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，可遥望到江对岸：长江和嘉陵江两条江汇合处，是这座山城的门扉朝天门码头。两江环抱的半岛是重庆城中心，依山而立的各式楼房，像大小高矮不一的积木。沿江岸的一处处趸船边，停靠着各式轮船。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，在坡上慢慢爬。拂晓乌云贴紧江面，翻出闪闪的红鳞，傍晚太阳斜照，沉入江北的山坳里，从暗雾中抛出几条光束。这时，江面江上，山上山下，灯火跳闪起来，催着夜色降临。尤其细雨如帘时，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，这座日夜被两条奔涌的江水包围的城市，景色变幻无常，却总那么凄凉莫测。

南岸的山坡上，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、草盖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偏偏房，朽烂发黑，全都鬼鬼祟祟：稀奇古怪的小巷，扭歪深延的院子，一走进去就暗糊糊

不见来路,这里挤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劳动的人。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,几乎没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设施: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,顺山坡往下流。垃圾随处乱倒,堆积在路边,等着大雨冲进长江,或是在炎热中腐烂成泥。

一层层的污物堆积,新鲜和陈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。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钟,能闻到上百种不同气味,这是个气味蒸腾的世界。我从未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,或是在垃圾堆集场,闻到过那么多味道。在各色异味中生活,脚踢着臭物穿行,我不太明白南岸人,为什么要长个鼻子受罪。

老是在说,抗战时日本人投下的炸弹,有好多没有爆炸,落在山坳沟渠,埋在地底;国民党 1949 年底才弃守这个城市,埋下炸药有几千吨,潜伏特务十几万,经过五十年代初的大清洗,依然可能有无数特务漏网。他们不会在对岸中心区的水泥大厦间、柏油马路上活动,喜欢偷偷潜行在这个永远有股臭味的南岸:这个本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,自然该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出没。

只消走出门来,倚着潮湿湿的墙,侧着耳朵听:打更棒棒一声声敲着黑夜,没准蜘蛛网罩住的房门,会神秘地露出一只旧时代的红平绒绣花鞋;那匆匆消失在街转角的男人,黑毡帽压低,腿上藏着尖刀。阴雨天暗时,走在脏水漫流窄坡上的每个人,都是一副特务嘴脸。随便在哪一寸地上,掘地三尺,没准就可挖到未爆炸的炸药炸弹,或是一本写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密电码本,或是用毛笔记录了各种怪事的变天账。

一江之隔,便有许许多多的区别。半岛之上的城中心,那是另外一个世界,到处是红旗,政治歌曲响亮欢快,人们天天在进步,青少年们在读革命书,时刻准备长大做革命的干部。

而江南岸，是这大城市堆各种杂烂物的后院，没法理清的贫民区，江雾的帘子遮盖着不便见人的暗角，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。

从过江渡船下来，颤颤悠悠过跳板，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多分钟，抬起头来，一层层一迭迭破烂的吊脚楼、木房、泥砖土房。你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，唯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，面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，伸向江面。这一带的人都管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，它位于野猫溪副巷。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条陡峭的坡道，青石板石级低低高高不匀，苦楝树，黄桷树，还有好些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，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。八号院子嘴嘴院墙和大门黑黝黝，一侧墙红黑砖相间，任意地泼了点色彩。那是得福于一场雷雨，电劈掉了半壁墙，重砌时，碎砖不够，找来一些红砖填补。

这还不是我的家。从窄小的街上看，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。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，我家院子是六号，顺山坡地势，略略高出前二个还算像样的院子，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。中间是天井，左右是一大一小两个厨房，四个阁楼。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，连接后院，还有阴暗的楼梯，通向坡下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。

这么一说，像个土财主的宅子。的确，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，1950年共产党来了，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，家具和几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。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，立即半被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。什么堂屋，回廊，后院，偏房，阁楼等等，只是方便的称呼。

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，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人，大都是三代人，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，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，数到一百时必掉数。

3

我家一间正房，只有十平方，朝南一扇小木窗，钉着六根柱子，像囚室。其实我们这种人家，强盗和小偷不会来光顾。窗只在下雨时在冬天夜里关上。而窗外不到一尺，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实，开了窗，房里依然很暗，白天也得开灯。从窗口使劲探出头往那墙顶上看，可看到一棵大黄桢树的几枝丫丫。从中学街操场坝流下的小溪，在树前的峭壁上冲下陡坡，从那儿流入江里。夜深人静，溪水哗哗响，一点也不像野猫，倒像一群人在吵架，准备豁出命来似的。

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，不到十平方，最低处只有半人高，夜里起来不小心，头会碰在屋顶上，把青瓦撞得直响。有个朝南的天窗，看得见灰暗的天。

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、三个姐姐、二个哥哥和我。房子小，人多，阁楼里两张父亲手做的木板床，睡六个孩子。楼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里，一个藤绷架子床，余下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，一把旧藤椅，一张吃饭桌子。

家里孩子大了，夜里只能拆掉父母房里的桌子，放一个凉板床，两个哥哥睡。白天拆掉凉板床，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，洗澡的时候，再拆掉桌子和凳子。说起来手续繁杂，成了习惯也简单。

1980年，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。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，父母只带着两个女孩。五十年代鼓励生育，人多热气高，好办事，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。

从我生下，我们一家成了八口。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，以前，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，现在文革结束了，知青返城，开始长住家中。到1980年这两间板房快挤破开了，像个猪圈，简直没站脚的地方。这年夏天的拥挤，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。

几天前母亲对我说，大姐来信了，就这两天回来。

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，因为最早，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。她离过三次婚，有三个孩子，最大的比我小六岁，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，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。“天棒！”^①母亲一提起大姐就骂。“我哪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？”大姐一回来，呆不了几天，就会跟母亲大吼大吵，拍桌子互相骂，骂的话，听得我一头雾水。直到把母亲闹哭，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。

但不知为什么，大姐不在，母亲就会念叨。一听见大姐要回来，母亲就坐立不安，时时刻刻盼望。我总有个感觉，这个家里，母亲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，知道了也觉得无关的拐拐弯弯肚里事。

就这年夏天，好多事情让我开始猜测，恐怕那些事与我有点关系。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让我套出一点口风的，是大姐。

^① 四川话，莽汉的意思。

因此我也和母亲一样，在盼大姐回来。

我是母亲的一个特殊孩子。她怀过八个孩子，死了两个，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，我是么女，第六。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殊，不是因为我最小。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，从不宠爱，绝不纵容，管束极紧，关照却特别周到，好像我是个别人的孩子来串门，出了差错不好交待。

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，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。他平时沉默寡言，对我就更难得说话。沉默是威胁：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，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贴的皮肉。哥姐们，母亲一味迁就纵容，父亲一味发威。对我，父亲却不动怒，也不指责。

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，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。

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，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。

4

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，坐在一张矮木凳上，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。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，凳面有个小方块，嵌镶着四块瓷砖，中心是朵红花。这样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。他熟练地裹烟。堂屋里光线黯淡，但他不需看见。他眉毛不黑，但很长，脸上骨骼突出，眼神发亮，视力却差到极点，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很少笑，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，也从未见他掉过泪。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，一定堆积了无数人生经历。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，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。

我放学回家，见房门紧闩，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。

“是你妈回来了，”父亲说，极浓的浙江口音，“饿了没有？”他掉过头来问。
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

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。

父亲说：“饿了的话，先吃点填肚子。”

“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，”我说。听着房门里洗澡声，我突然不安起来。

母亲一直在外面做临时工，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，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。四人抬的氧气瓶，过跳板时只能二人扛过去。她抢着做这事，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。被救上岸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我还能抬。”

她不是想做模范，而是怕失去工作，临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。她抬河沙，挑瓦和水泥。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，母亲赶去了。那时还没我，正是大饥荒开始时，母亲饿得瘦骨嶙峋。耐火砖又厚又重，担子两头各四块，从江边挑到山上，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。一天干下来，工钱不到两元。另外两个女工，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，又累又饿，再也迈不开步，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。被人看见告发了，当即被开除。

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，失去了打临时工的证明，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。

那里的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，对母亲说：有个运输班，都是些管制分子，你怕不怕？母亲赶紧说不怕。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“群众监管”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，没人肯去干的活，才轮到这批人去干。

母亲随整个运输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，干体力活，汗流浹背，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，迈着一样的步子，抬筑地基的条石，修船的大钢板。她又一次落到江里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，人工呼吸急救，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。

母亲做了十多年苦力后，心脏病，贫血转高血压，风湿关节炎，腰伤，一身都是病。在我上初中时，才换了工种，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。算是轻活，烧全天。半夜里把煤火封好，凌晨四点把火启开，通煤灰，添新煤旺炉火，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。

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，周末才回家。回家通常吃饭倒头就睡。哪怕我讨好她，给她端去洗脸水，她也没好声好气。

卷起她的衣服擦背，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疱，像骆驼背，两头高，中间低，正好稳当放杠子。擦到正面，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，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。等不到我重新拧一把毛巾，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。她的右手垂落在床当头，双腿不雅观地张开。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，跟猪一样，还流口水。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，厌恶得把脸掉转到一边去。

母亲在外工作，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，到晚上天黑，他眼睛看不到，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。我生下后由父亲把我带大。

星期六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，全家肉票加起来，割半斤肉。做成香喷喷的一碗，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。母亲还不领情，挥挥筷子，绕过肉不吃。父亲有次火了，拍桌子，搁了碗筷。他们二人你来我去，然后把我们的门，

关门吵架,争得越来越激烈,声音却明显放低,很怕我们听明白似的。我认为母亲是到父亲身上撒气,心里更对她窝一肚子火。

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,不管是上街或是走亲戚。母亲岁数越大,脾气越变越怪,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。粗话,下流话,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,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,我从小听惯了。但这是我的母亲,她一说粗话脏字,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。

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: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,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;她关门砰的一声,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;她说话声音高到像骂人,这些我都受不了。

我当面背后都不愿多叫她一声妈妈,我和她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。

我总禁不住地想:十八年前,当母亲生我养我时,更明白说,十九年前时,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,怀上了我?

打我有记忆起,就从未见到我的母亲美丽过,甚至好看过。

或许是我自己,故意抹去记忆里的她可能受看的形象。我看着她一步一步,变成现在这么个一身病痛的女人的,坏牙,补牙,牙齿掉得差不多。眼泡浮肿,眼睛混浊无神,眯成一条缝,她透过这缝看人,总认错人。她头发稀疏,枯草般理不顺,一个劲掉,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,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住。她的身体好像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,因为背驼,更显得短而臃肿,上重下轻。走路一瘸一拐,像有铅垫在鞋底。因为下力太重,母亲的腿逐渐变粗,脚指张开,脚掌踩着尖石碴

也不会流血，长年泡在泥水中，湿气使她深受其苦。

唯有一次，早晨刚醒来，我听见母亲趿着的木板拖鞋，在石阶上发出好听的声音。她从天井走到院外石阶上，打着一把油纸伞，天上正飘着细雨。我突然想她也有过，必然有过丝绸一样的皮肤，一张年轻柔润的脸。

我慢慢地明白了，母亲为什么不愿照镜子。她曾向三个姐姐抱怨，说家里一面像样的镜子都没有。谁也没搭这个茬，看来，她们比我还知道母亲实际上讨厌镜子。

在母亲与我之间，岁月砌了一堵墙。看着这堵墙长起草丛灌木，越长越高，我和母亲都不知怎个办才好。其实这堵墙脆而薄，一动心就可以推开，但我就是没有想到去推。只有一两次我看到过母亲温柔的目光，好像我不再是一个多余物。这时，母亲的真心，似乎伸手可及，可惜这目光只是一闪而逝。

只有到我十八岁这年，我才逐渐看清了过往岁月的面貌。

5

房门打开了，洗完澡的母亲对我说：“六六，你把倒水桶给我提来。”她穿了件自己缝的和尚领无袖衫，裤子短到膝盖，脚上还是一双旧木板拖鞋。

母亲和我一起端起洗澡用的大木盆，往木桶里倒洗得混浊的水。母亲说大姐不是今晚就是明天，应该到家了。

我故意地说：“你等不到她，她准是骗你的。”

“不会的，”母亲肯定地说，“她信上说要回来就得回来。”

提起大姐，母亲的脸色变得柔和多了，我瞥了她一眼，一不小心，水滴在三合土地上，她骂斥道：“好生点嘛！叫你做事，

你就三神不挂二神。”

我提着满满一桶水，迈过高过房地面一截的木槛。“别倒掉，隔一阵，你得拖楼上的地板，”母亲在房里大声地说。

水精贵，一是水费高，二是常停自来水。几百户人家，共用一个在中学街后的自来水管。排队不说，那水总黄澄澄的，如果下江边去担江水，汗流浹背地挑上来，还得用明矾或漂白粉澄清消毒，做饭菜有一股铁锈味。除非断了自来水，平日江水只拿来洗衣拖地板。

每家地小，仅容得下一个不大的水缸，还只能放在公用厨房里，一整家人用，再多的水也不够。男人都下河洗澡，懒得下坡爬坡的人就在天井的石坎上放一盆水，身上只剩裤衩。反正这里的男人，夏季整个白天也只穿裤衩，打光背。

讲点脸面的男人夜里洗，大部分男人不讲脸面，光天化日下照洗不误，一盆水从头浇到脚，白裤衩被水一淋，黑的白的暴露无遗。我是个小女孩时，就太明白不过男人有那么个东西，既丑恶又无耻地吊在外面，我到厨房去取东西或往天井水洞倒脏水，就看见天井站着一排男人，老的，少的，白肉生生，一个紧挨一个，挤在唯一必经的过道边上，他们甚至当众在天井的水洞里解小便。

绵长的夏天，经常一个月不下一滴雨。长江开始涨水，上游来的水仿佛来得很慢，一旦到了旺水季，一夜间却会淹没上百米的泥滩。这城市之热，没住过的人，不可能明白：从心烧，贴着皮肤的毛孔，火苗般一丝丝地烤。没有风，有风也是火上加热，像在蒸笼里，紧压着让你喘不出气。

家里女人洗澡，男人得出去，到街上混，待到家里女人们一个个洗完了，才快快回家。女人放好木盆倒上水，掺一丁点